

第一章

盪氣迴腸香港心

耶穌會

余理謙神父



Rev. James Hurley, S.J.

在菲律賓休假學習這一段日子裡，我真正體驗到亞洲地區的工人和學生強大的力量，為了爭取人權、民主和公義，為了教會，為了貧苦農工，他們要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有多大。

第一章 盪氣迴腸香港心

耶穌會余理謙神父

(Rev. James Hurley, S.J.)	21
(一) 香港情意結	23
(二) 在華仁書院見面	26
(三) 一段憂鬱的回憶	29
(四) 地上的禮物包	34
(五) 不一樣的故鄉	38
(六) 從愛爾蘭出發	42
(七) 許願終生奉獻給香港人	46
(八) 山雨欲來風滿樓	49
(九) 從希望到失望	52
(十) 當晚要向主教交代	56
(十一) 患難知己龔樂年	60
(十二) 去馬尼拉學習	64
(十三) 到製衣廠打工	68
(十四) 迂迴曲折先知路	71
(十五) 余神父常用的四節箴言	74
(十六) 返鄉下耕田	76

耶穌會 余理謙神父
Rev. James Hurley, S.J.



余理謙神父於2014年道別香江。



余神父引證古經，感覺自己越來越像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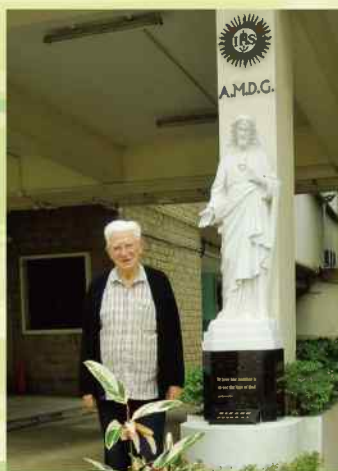
書架上幾張照片帶給余神父許多難忘的回憶。



余神父愛護貧苦大眾，常常私下紀錄他們的需要。



余神父與作者鍾炳基在九龍華仁書院餐房合照。



余神父在華仁書院耶穌會會徽——愈顯主榮前留影。



九龍華仁書院原是一塊荒廢的農地。

(一) 香港情意結

從任何角度來看，香港在半個世紀內的變化是不可思議的。

我在巴富街中學唸書的幾年^{註一}，常常爲了一碗叉燒煎蛋飯，在午餐時候，從何文田飛著單車到油麻地的一間茶餐廳去，人未坐穩，相熟的企檯已經把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叉燒飯端來：上面鋪隻煎荷包蛋，下面墊塊叉燒，澆點豉油，好吃極了。此外，大牌檔的牛腩河、魚蛋粉、鬆糕、炸兩、白粥、腸粉、熱奶茶、菠蘿油等等，都令我懷念無窮，盼望有一天可以重遊舊地，重溫古味。

除了食物，我還有許多香港情意結。

1964年我住在黃大仙竹園村，之後木屋區遇上一場火災^{註二}，我們被遷到橫頭磡，無論在木屋區也好，徙置區也好，環境都非常惡劣，白天黑夜，絕對沒有一點多餘的立足之地。領洗以後，聖堂變成我家外之家，神父變成我家內的家長。當時不同堂區有不同的傳教士服務，擔任著不同的工作，我常常接觸的包

括：東頭村福德中心的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修會)、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愛爾蘭耶穌會，及大嶼山熙篤苦修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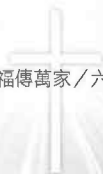
2012年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開幕五十週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宣布，從2012至2013年基督普世君王節為止，普世教會同心慶祝「信德年」，我當時在想：如果可以重踏香港教區，把這些與我成長同行的傳教士生活點滴紀錄下來，作為「信德年」的一個手信，回饋香港教區，那該多好！

然而，五十年來，香港不知翻了多少次身，改變了多少面孔，換了多少新血，一切人地事對我來說都顯得陌生和隔膜，這使各方面的溝通和信任產生很大的障礙，「信德尋根」這計劃，想起來就覺得不著邊際。

五月溫哥華的陽光燦爛，我正在園圃裡埋首工作，手機突然響起來：

「鍾炳基，你身為會長，為甚麼開會總是缺席？」對方聲音響亮，夾帶著責怪的腔調，給我大嚇一跳，來電者原來是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多年前的神師余理謙神父 (Father James Hurley, S.J.)。

余神父令我很自然地聯想起當年香港珠海書院的



學生，他們曾經在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彈劾學校的文章，引起許多社會人士的共鳴，珠海書院在慌亂中開除了他們的學籍。余神父當時在珠海任教，在幾名學生苦苦哀求下，他挺身而出，毅然為他們請命，最後甚至公開在報章上發表支持學生、批評學校的言論，這位「洋和尚」敢作敢為的作風，在當時香港頗為罕見，所以余神父很快就成為報章日夜報道的風頭人物。

這一天，原來是余神父八十七歲的生日，一群舊日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幹事正在替他慶祝，我於是順口向他提出做訪問的要求，又為了怕他推搪，請他不要急著回答，但余神父卻出乎意料之外，毫不猶豫地說：

「好吧，我們約個時間見面，我會全力合作！」

從手機裡聽到，當時在座的朋友都替我歡呼起來，並主動提出在香港住宿和聯絡各方面的幫忙。信德年的旅程，就這樣剎那間展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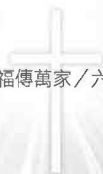
(二) 在華仁書院見面

2013年11月，我專程從加拿大回到香港，在九龍華仁書院訪問了余理謙神父(Rev. Father James Hurley, S.J.)，從他口中記錄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余神父在1958年告別家鄉愛爾蘭(Ireland)之後，直到他在2014年10月因病退休為止，在香港不離不棄的傳教服務，跨越了半個世紀。

香港資深作家李韓玲小姐，曾經形容余理謙神父年輕的時候「像好萊塢影星格力哥利柏 (Gregory Peck)」。^{註三}

我心裡也在推想：一個絕不言敗的「愛爾蘭戰士」(The Fighting Irish)，在香港經歷過五、六十年風風雨雨，面對過不同的社會事件，擔當過不同的工作崗位，服務過不同階層的堂區，隸屬過不同的主教和會長，今日，余理謙神父會被打造成一個怎麼樣的人？

香港11月的天氣有點像溫哥華的夏日，雖然我已經離別了四十多年，習慣了北半球嚴寒的天氣，但走在街上仍然感到清爽舒適。



從油麻地地鐵站走上窩打老道，不過十來分鐘，就見到華仁書院。入口處現設有鐵閘，經過通傳後，保安人員叫我在停車場等候。

華仁書院是一間香港著名的男子英文中學，歷年來，畢業生對香港政治經濟和各方面的發展，都有卓越的貢獻和成就，在政府機關擔任高職，或在社會名流中佔有顯要地位的不少，但主理華仁書院的耶穌會神父和修士，都曾經不斷在逆勢下艱苦經營。

早期到香港的耶穌會神父，最終本來都希望到中國內地傳教，但後來決定留在香港，專心致力於專上學院教育的工作。他們曾經嘗試創辦香港第一間大學，可惜被人先拔頭籌，香港大學於1911年成立，耶穌會卻被委任管理利瑪竇學生宿舍的工作，而香港華仁書院，本來也是私人經營的，直至1932年才交給耶穌會接辦。^{註四}

九龍華仁書院在1955年建成，現在除了校舍，還是耶穌會會士在香港的宿舍。之前，這裡本來就是一塊荒廢的農地，現在還可以從附近許多有趣的街道名稱揣測出來，如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等。耶穌會經過許多折騰，英國政府才肯放手把這幅地讓給他們辦學。

華仁書院的成立，是因爲殖民地的需求應運而生的。香港自從開埠以來，一切書信、證件、檔案，都以英文爲合法標準，不論政府機關，或私人企業，各級官員必需懂英語，因此英文書院很快就到處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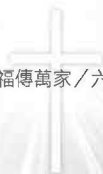
站在華仁書院的停車場，我正思前想後，余理謙神父突然從電梯裡走出來，一見面，就很親切的向我伸出手來：

「歡迎！歡迎！」

余神父雖然走路有點蹣跚，驟眼看去，依然神采飛揚，一頭不經意的銀髮，襯托出眼鏡後面炯炯有神的雙目，顯然，歲月和陽光在輪廓分明的眉頭臉額上，烙過許多痕跡，但當年「學運鬥士」的風範，絲毫未減。

「最近膝蓋動了手術，走路大不如前了！」余神父走進電梯時說：「耶穌會神父的醫療健康，一般都由華仁校友捐贈，這次手術是一位華仁畢業的醫生替我做的。」

從電梯走出來，余神父站在走廊，指著校園附近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說：「現在我很少出外探訪教友，因爲行動不方便，而且華仁周圍沒有公屋，沒有屋邨，都是高尚住宅區。」



(三) 一段憂鬱的回憶

經過神父的餐房，見裡面一片寧靜，桌椅整齊清潔，好像是個不常使用的地方。餐房盡頭，窗外陽光燦爛，正想提議進去歇歇足，余理謙神父卻提議先喝一杯咖啡，我們拉張椅子坐下，沒有繁文褥節，氣氛驟覺輕鬆起來。

「華仁算是你到香港時初出道的地方吧？」我問。

「不錯，華仁可以算是我的老家！」余神父交叉著手臂回答。

「1960年到香港時，我要在長洲學習兩年廣東話，閒時在長洲聖堂做些牧民工作，主要是教兒童道理班，我非常喜歡這段日子，我跟當地人感情很融洽，並且希望留在長洲，但會長卻堅持要派我到九龍華仁書院教英文，我做了僅僅兩個月便向會長請辭，自己跑到附近亞皆老街的珠海書院教書去了。

「這餐房常常令我想起一件事：大概是1971年4月初的一個星期六，我清楚記得是復活節前一天，我在

華仁書院講避靜道理，當天有一班學生，爲了保衛釣魚台，到中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抗議，警方出動了防暴隊，企圖驅散他們。

「正當避靜將完結時，突然有幾個年輕人從外面喘著氣走進來，大聲喊道：『警察拉了學生！警察拉了學生！』」

【這是香港有史以來，學生第一次因示威而被警察拘捕。】^{註五}

「我立即趕到界限街明愛中心的學生會所，大概是晚上六時左右，和幾名青年商量要立即處理的問題，談了好幾個鐘頭後，已經深夜回到宿舍，電話仍然不停打來，氣氛十分緊張，大家的心情都很徬徨。

「二十多名保釣學生，第一次因示威遊行被警察拘捕，自然引起香港社會廣大的迴響，但大部分市民都抱著漠不關心的觀望態度，真正插手幫助的人寥寥可數。至於還沒有被介入的學生，由於沒有先例可援，都希望我趕快帶頭做些挽救工作。

「第二天是復活節主日，我大清早開完七點半彌撒之後，就趕快回到明愛服務中心，繼續和幾名青年討論，研究可行的方法，從早上直到深夜，大家都筋疲力盡才離開。

「接著的星期一是復活節公眾假期，我夜裡睡得不安寧，起床晚了，心情很沉重，準備到餐房喝杯咖啡，一方面掛念著被捕的學生，另一方面擔心那一批徬徨的青年。

「就在我倒咖啡的時候，近餐房門口的地方突然有兩位神父走進來，一邊連連串串的說了一番辱罵我的話，一邊指著問我，為甚麼不做好神父的本份，要整天出去做英雄？

「我突然怔住了，我會為幫助弱勢的人，而被自己耶穌會的神父攻擊，這事可能嗎？【其中一位神父，後來還做了我的會長。】

「我狼狽地竄回房間去，躺在床上，定睛看著天花板，心裡既惶恐又慌張，一剎那間，不知所措，不斷責問自己：

「我為甚麼要做神父？我為甚麼要繼續留在耶穌會？

「我內心感到很大的困擾、矛盾和慌張。我反覆地問自己，要一意孤行的走傳教之路，是否值得？我前面的路，隱藏著甚麼危機？

「後來，我度過了一段很漫長的抑鬱的日子，精神受到很大很大的刺激，我開始變得有點神經質了！

那些日子裡，無論天晴天雨，我都常常帶著雨傘出街，怕被人埋伏暗算，心想，必要時甚至可以把雨傘當做武器。

「我也在界限街明愛中心會所，準備了一個私人小房間，放置些簡單衣物和乾糧，準備有必要時，可以在哪裡留宿一兩天，躲避一下。

「現在看來，覺得當時的行為又好笑又古怪，可能因為我當時缺乏了信心和安全感。

「在這段精神受壓抑的日子裡，我不斷評估個人的價值觀、聖召和角色，也常常跟修會會長交流意見。

「在一次嚴守靜默的大避靜當中，我哀求耶穌會主保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賜給我智慧和力量，幸好，我很快就感到聖人的祝福，不但心情漸漸平靜下來，而且覺得自己正走著準確的方向。」

【那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 - 1965年)剛剛結束，教會出現一種突破性的新面貌，大公會議鼓勵教友積極參與社會正義和平的行動，分擔弱勢社群的憂慮和喜樂，放眼世界以外不同需要的人。】

余理謙神父低頭沉思了一會，喝口咖啡，又繼續

未完的話題：

「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文獻，帶給我很大的安慰和勇氣。《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裡的這句話，我尤其喜歡：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
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
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

「我覺得以上這幾句話，在大公會議所有文獻之中，包括四個憲章、九個法令、三個宣言，它是最美麗、最有特色的了。

「它很清晰的挑戰教會，去擁抱世界，與社會舉步同行，致力於一種『新』的福傳，把耶穌的喜訊傳送給草根階層、受壓迫的、爲了生存而勞苦奮鬥的廣大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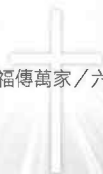
談得興緻正濃，一位老神父蝸蝸地走進了餐房。華仁宿舍目前住了好幾位退休神父，餐房是公用的，余神父禮貌地跟他打了個招呼，然後示意我轉到他的房間去。

(四) 地上的禮物包

華仁宿舍在學校頂層，是耶穌會神父修士專用的，從1950年代開始，余理謙神父基本上就以這裡為大本營，房間雖然不大，又沒有空調，但窗門都打開，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璀璨奪目，室內空氣清新，溫暖而舒適。房內除了床、桌和椅，就是書架，書架上零散地放著許多插滿標籤的書籍，看上去都有點古早味兒，後面牆上掛著兩張中國書畫，還有旁邊掛著「天主保佑」四個大字，畫和字都顯眼地題上感激神父的話，相信是一些教友送贈的，書架旁陳列著許多大小相框，每張相片都訴說著它的故事。

進得門來，神父趕忙把椅子和地上一包兩包的禮物重新堆置，騰些位置給我。正想給他送頂高帽子，讚他人氣旺盛，收到這麼多「粉絲」的心意，余神父卻開門見山給我解釋說：

「這些禮物都是過兩天要轉送給有需要的家庭的，我經常去探訪監獄，回來後，很多時會跟進和囚犯家人聯絡，盡力在經濟、工作或學校方面給予援



助，幫助他們的父母或子女。」

過去二十多年來，余神父曾經在好幾個堂區服務過，但他最津津樂道的，除了曾在工廠工作，就是在牛頭角基督勞工堂做助理司鐸的時候。

在那裡工作的十一年中，他不但認識了許多低下層的勞工家庭，還成立了青年正義和平小組，及積極推廣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Hong Kong)，支援良心犯人。

余神父隨意拿起書架上一張照片，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創辦人，英國班奈森律師(Peter Benenson, 1921-2005)於1993年訪問香港時拍攝的，當時余神父在黃大仙聖雲先堂做本堂，他想起班奈森的訪問：

「雖然黃大仙區內居民生活貧困，但教友信德活躍，是發展信仰小團體的溫室，所以胡振中樞機在1988年發表的牧函《邁向光輝的十年》中的一項大計劃『基基團體』(Basic Christian Community)，就是首先在聖雲先堂試辦的。

「當時除了參與基基團和特赦組織的工作，我還積極推廣宗教合一的活動。

「爲了讓班奈森有機會認識一點道教文化，我提議帶他去參觀黃大仙古廟，但他一口拒絕，結果他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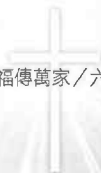
擇獨個兒留在小聖堂祈禱。

「我一直都有支持良心犯人的活動，直至班奈森過世，可惜後來我對特赦組織的其他宣傳活動，卻有點保留。」

說起良心犯人的活動，余神父又想起一位曾經求他幫忙的母親。

「她有兩個兒子，可惜都因為加入了黑社會，被派出去殺人，判了十五年監禁，她每次探監，都要以我的身份陪同下才敢進去，怕惹家人麻煩，其中一個兒子由於行為良好，十年便可出獄。出獄那天，有一位神秘訪客帶了一筆很大數目的錢給他，他卻即時拒絕接受。我知道這件事後，立即幫他改名換姓，以免被人跟蹤，他還自願到各堂區去分享他的經歷，後來更被邀請加入聖母軍。三年後，他跟團裡一位姊妹結了婚，現在做垃圾站回收工作，很多教友都間接或直接藉著他，幫助貧苦及有需要的人，他很聰明勤力，我很希望他將來能夠當社工。」

說罷，余神父從抽屜中拿出一本「帳簿」給我看，裡面紀錄了善長的捐款和救濟人的日期及名單，粗略對照一下，都是左手來、右手去，還經常從零開始之類。



余神父卻興高采烈地，借用聖金口若望(St. John Chrysostom, 344 - 407)的話解釋說：

「當我送給窮人必需的物品時，我送上的，
不是我個人的慷慨，而是退還原來屬於他們的東西。

與其說是愛德，不如說是實行了正義。」

(五) 不一樣的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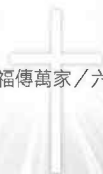
從書架上看到幾張余理謙神父溫馨地擁抱著孩子的照片，問他暑假回愛爾蘭的情況。

「這次回家鄉，到處都見到活潑的孩子，當然很高興，可惜許多親人已經不在世了。爸爸、媽媽、哥哥和兩個姊姊也已經離去，我家人之中，只剩下我一個了。愛迪磨(Ardmore)原是我天天懷念的故鄉，但隨著親人一個一個的去世，它已經是個不一樣的故鄉了！」

言下歎歎，不勝傷感。

「五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離開家鄉那一天，要跟爸爸道別的一情一景，到現在仍然記得清清楚楚。我1926年出生，那時候，愛爾蘭正在爭取自由獨立，民生窮窘，物資缺乏，尤其是在我們窮鄉僻壤的地方。」

【愛迪磨(Ardmore)位於愛爾蘭東南端，是一處緊貼著大西洋的古老漁村，直至今日，懸崖峭壁上還保存了無數古代隱修士的洞穴，村落中的許多古老聖堂



和祭壇建築仍然完整無缺，可以想像千百年來，村民的信德是怎樣堅固。】

「爸爸是個非常刻苦耐勞的人，受過很少教育，但因為他勤奮耐勞，樂於助人，令村裡的人對他非常尊敬，他爲了子女和家人的幸福，日夜工作，從不歇息。

「我家裡有四兄弟姊妹，我是排行最小的，由於哥哥一早已經當了神父，我是孺仔，家人自然對我寵愛，尤其是爸爸，對我呵護備至，每次知道我在學校成績優異，或者棒球(Hurling)出色，他就歡天喜地，不停在人前讚我給我打氣，鼓勵我立志做一名職業球手，但有時他也非常坦白，寧願有一天我會接手他的生意，把他的名字保存下去。

「媽媽是個非常熱心的教友，每天黃昏，必帶領家人一起唸玫瑰經，爲傳教士祈禱，把家務收拾得井井有條之餘，她在村裡、在堂區都很活躍，大家都公認，媽媽虔誠的榜樣和活潑的信德，對家人、對鄰人影響很大。

「有一次我打棒球時弄傷了腳踝，在家休養，看見廳裡放了一疊二疊有關耶穌會神父去中國傳教的小冊子，故事寫得真切動人，我讀過後就告訴媽媽，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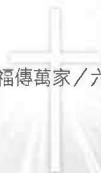
希望將來有一天可以做個耶穌會的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去，當時媽媽默不作聲，但我知道，原則上她會支持我的。

「入耶穌會做傳教士這件事，我沒放在心裡，擱置了幾年，也沒有刻意再去想它。

「其實，中學時我在一間管理頗嚴格的熙篤修會學校寄宿，畢業那一年，因為參與一點抗議示威，竟被校監發了一封指責我行為不檢的家長信，這封警告信對我畢業或入修院，都構成一個很大的陰影。

「但是，當我畢業前向校方提出我要去做傳教士的志願時，結果卻大大超乎我所預料之外，熙篤會校監不但寫了封很好的推薦信，還極力鼓勵我做神父的聖召，催促我跟當地耶穌會的神長接洽。之後，他們建議我要首先跟爸爸商量一下，看看我是否可以嘗試進入備修院兩年，測驗我的適應能力，假如將來要改變初衷，可以另作打算，因為大家都知道，耶穌會有嚴格的規定，發了初願，就永遠不能再回心轉意了。除此之外，為了避免被其他條件束縛，我還要放棄申請國立大學獎學金的機會。

「我考慮了很久，終於鼓起勇氣，向爸爸提出入修院的決定，他細聽之下，知道我已經放棄了申請三



年大學獎學金的機會，顯然決心已定，爸爸頓時變得非常沮喪，天天上班時，都默不作聲地走出門外，家裡的人爲此都沉默了好幾個星期，我心裡也感到灰暗難過。

「後來有位親人對我回憶說，她常常聽到爸爸入夜之後，雙手合十，跪地祈禱：願承行祢的聖旨！」

「入修院那一天的大清早，家人就爲了我的別離忙作一團，爸爸卻不斷在房間裡大哭，就在他一言不發地準備去上班那一刻，他突然剎住車子，跑回屋內，緊緊地擁抱著我說：

『我兒再見！我兒保重！』」

余神父說到這裡，熱淚盈眶，滲滿哀傷與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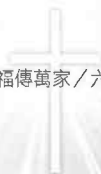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曉得，這就是我們父子最後的一次道別。」

(六) 從愛爾蘭出發

「兩年的備修生活我過得輕鬆，很適應，我決定發初願。此後，爲了使我有機會吸收到不同的思想和知識，會長派我到愛爾蘭國立大學，攻讀古典文學及哲學，我心胸豁然開朗，視野擴闊了許多。

「在大學唸書時，我特別喜歡愛爾蘭大文豪柏德烈貝斯(Patrick Pearse, 1879-1916)的詩文，除了崇拜他的才華，我也敬佩他的愛國情懷，他在1916年策劃的復活革命中(Easter Rising)，被英國政府逮捕了，參與行動的人都通通被處決，十六個當中，還有我家鄉愛迪磨(Ardmore)的人，這件事沉重影響了我一生，我極度仰望自由和獨立，對殖民主義產生很大反感。

「爲了徹底體驗傳教士的生活，我們四位修士在一位神父帶領下，在1952年離開愛爾蘭，乘船到香港去，在海洋上飄流了三十天。我們四個修士，一位神父，大夥兒擠在同一間房裡，船倉非常酷熱，我們第一次嘗到離鄉別井的滋味，實在很不習慣，但這都是心甘情願的。我們既然捨棄了一切，捨棄了親情、友



情、愛情，必需義無反顧，貫徹始終，這是做傳教士的基本條件，應該算不上甚麼犧牲吧？

「但抵達香港後，我突然收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心裡有如天崩地裂，不知所措。原來天主要的，是徹底底的犧牲！」余理謙神父說。

想起與爸爸臨別一刻的擁抱，一聲簡短的珍重，余神父不禁潸然淚下，感慨萬分。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們剛剛在香港抵岸時，耶穌會自己的會院還未建成，我們被安排暫時寄住在香港島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即目前中環的香港終審法院大樓，這座建築物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在1915年買入，1997年左右轉讓給香港政府做終審法院的。

「當新建的長洲思維靜修院及牧民中心成立後，我們便搬到那裡，一面在堂區接受牧民訓練，一面學習中文。我很喜歡長洲的工作，尤其喜歡教兒童道理班，我的廣東話進步得很快，這裡生活多姿多采，我希望留在長洲，多實習一點堂區工作，但不久之後，

就被會長派到九龍華仁書院，教了一年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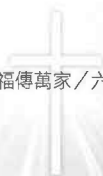
「當時香港的耶穌會會長也是愛爾蘭人，他曾趁著到羅馬述職時，建議總會長應該常常讓會士有回祖國的機會，使更多人了解傳教士在海外的生活，藉此吸引更多年青人追隨聖召，這對國家對教會都有好處，這項建議很快便被羅馬接納。

「1955年8月，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被調回祖國愛爾蘭，攻讀神學，準備晉鐸。返愛爾蘭途中，我們遇到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離開香港之後，途經意大利，船停泊在羅馬，有一位修士開玩笑說，想覬見教宗庇護十二世。在當年，教宗不但不會接見一小撮人，而且要提早預先安排，我們星期六晚抵達羅馬，星期三早上就要離開，行色匆匆，見教宗是一種妙想天開的想法。

「就在當天，我們在梵蒂岡遇見一位修女，經她輾轉查詢之後，教宗居然肯和我們會面！庇護十二世 (Venerable Pope Pius XII) 在二次大戰中，飽經憂患，人顯得消瘦疲倦，但精神矍鑠，他知道我們希望到中國傳教，非常高興，跟我們說了一番鼓勵的話之後，給每人送了一個聖牌，並逐一降福我們。」

【庇護十二世在位十九年當中，對中國百姓的情



懷，一直沒有間斷。在1939年當選教宗(舊譯教皇)後，他立即承傳庇護十世及十一世的熱忱，努力建立本籍教會，為中國教會聖統制鋪路。可惜在位不久，就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1939-1945)。炮聲猶在，中國又捲入國共兩黨的激烈鬥爭，隨著「三自運動」和「地下教會」的出現，教會在傳教工作上開始了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旅程。庇護十二世曾經以「和平使者」身份，在多次公開談話和通諭中，重申他對中國教會的熱切期望，他在逝世前(1958年)還特地寫了一篇勸喻內地神長的通諭。】^{註六}

(七) 許願終生奉獻給香港人

三年的神學課程過得很快，余理謙神父伸伸腰腿，回憶說：

「我很期待晉升神父的日子早些來臨，我熱切期待再回到香港服務，所以我在修院所選讀的，都是基本知識課程，當時我對神學、聖經，其實都是填鴨式的吞下去，要等到多年傳教之後，活學活用，才深入了解。比方在修院時，曾經研究過先知書，但都是應付了考試便算，對先知的使命和角色，卻是一知半解。

「1958年7月31日，我終於晉升了神父，跟著，我接受了兩年牧職和神修培訓。1960年，會長集合了我們訓話，並讓大家作出抉擇：可以去非洲或者去中國傳教，他並強調，這是個關鍵時刻，這次一別，很可能是永別，傳教士獻身事主，不能扶著犁，往後看！」

余神父夢想有一天可以進入中國傳教，他毫不猶豫的選擇回到香港，連同三位修士、一位神父，

跪在祭台前許願，一生為香港千千萬萬窮苦的、為環境受壓迫的人民服務。

未幾，五位年輕的耶穌會士，懷著破釜沉舟的心情，在海洋上飄浮了三十多天，再次回到香港。

1960年，余理謙神父在耶穌會牧民訓練中心學點中文之後，本來想留在長洲，學習堂區工作，但因為會長覺得他擁有英國文學學位，似乎大材小用，因此派他到九龍華仁書院教英文，這份看似優差而又稱職的工作，卻引起余神父極度反感，他做了僅僅兩個月便辭了職，自己跑到附近亞皆老街的珠海書院教書去了。

「全香港都是中國人，華仁的學生和老師也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會講中文，為何中國人不准講中文，要學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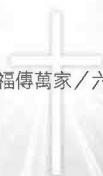
余神父聲音開始發抖，沉默了一會，眼眶和鼻腔變得通紅。

【愛爾蘭曾經被英國統治了七百多年，其間由於種族隔離及語言文化受壓抑而發生過不少流血鬥爭事件，很不容易等到1949年才正式脫離英聯邦，建立共和國，愛爾蘭人的蓋爾力語(Irish Gaelic)才成為法定語文，這種「三等市民」的痛苦回憶，余神

父仍然歷歷在目。】

「在英國統治下，人人都要講英文，我覺得很不合理，很不公平。我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對殖民帝國主義產生很大反感。而且這種民族意識，當時在年輕人中越來越強烈。」

香港位處中國邊緣，老一輩的香港人大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難民，很多仍心繫故鄉，對英國政治不聞不問，似乎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國領土上，中文居然沒有合法地位，對中國人太不公平了。



(八) 山雨欲來風滿樓

很多人認為，余理謙神父生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環節，要算他在珠海書院教學這段日子了(1961-1971年)，尤其是他在1969年為珠海學生出頭這件事，過去和現在的人，很多都會好奇的問：一位深得學生愛戴，深受學校器重，又有文學修養的外文系主任，怎麼會好端端地跟十二個被趕出校的學生扯在一起？

一位許了服從聖願，而又德高望重的傳教士，怎會跟學校火拼？

當時香港教區主教、耶穌會會長，和英國政府的高官，會用甚麼殺雞警猴的行動，來打壓一位膽敢公開支持青年示威的年輕耶穌會神父？

數年前，我在清理雜物中，偶然發現一疊《70年代雙週刊》雜誌和幾本中文舊書，其中有一本中國革命文學家茅盾先生，於1981年三月去世前寫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

《70年代雙週刊》是珠海學生吳仲賢於1970年與莫昭如等人合力創辦的，是香港第一份很有前衛風

格、很有年輕人活力的報章。

翻閱《70年代》勾起不少回憶，不知幾許民主學運的烈士，在香港七十年代付出了生命、血和淚，心中不禁向他們致敬，當時離開1997年回歸還有一段漫長的歲月，如今猛然回首，才發覺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1960-70年代，香港年青人高舉紅拳爭取中文合法化，經歷十年之久。

《我走過的道路》最吸引我的部分，是茅盾先生
在第十章記述1925年5月30日，上海大學發起民主運動

與商務印書館罷工的前後經歷。^{註七}

學生利用罷工、罷課、遊行和示威，去引起社會人士的廣泛關注和醒覺，去抗議日本人和英國人利用不平等條約，欺詐工資、毒打童工、藉故開除工人等不公義行爲，終於發動針對英國之省港大罷工。

茅盾先生用唐朝詩人許渾的《咸陽城東樓》一句開場白：「山雨欲來風滿樓」，來揭開上海大學的青年五三十民運的序幕：

一上高城萬里愁 蒹葭楊柳似汀洲
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
——唐朝詩人許渾《咸陽城東樓》

最令我驚訝的是，1925的上海「五三十」運動，與1969年的香港珠海事件，從爆發到結局，居然有許多雷同的地方，兩者相差不到半個世紀，但竟然會在同一國土上悲劇重演。

著名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曾經說過：「不汲取歷史教訓的人，就要注定重蹈覆轍。」

(九) 從希望到失望

在1969年的珠海事件中，余理謙神父替香港開拓了學生運動的先河，爲了此事，他觸怒了許多人，四十多年來，他受過不少教會內外人士的折騰，有時不能不三緘其口，如今事過境遷，大概可以暢所欲言吧？

「哈哈，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余神父似乎贊同我的說法。

珠海書院是1949年大陸易權時，從廣州的珠海大學遷來的，當年校舍位於九龍旺角亞皆老街，與香港德明中學及九龍大同中學齊名，他們教授的課程及頒發的畢業證書，都是中華民國教育部認可的。每年，他們會在香港舉行聯合招考，合格取錄的學生，就以僑生資格被保送到臺灣各大學院進修，由於香港當時只有兩所大學，即香港大學及初成立的中文大學，所以申請去臺灣升學，競爭仍然激烈。

1960年，余理謙神父在愛爾蘭晉升神父之後，選擇重回香港服務。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被派到九龍華

仁書院教英文，但他很快便向會長辭職，自己申請到珠海書院教英國文學去。

「我在珠海書院教得很開心，與校長和教師都合得來，我開始對當時香港年輕人的思想路線，感到極大興趣。一有空，我就跟同學們談天說地，討論世界時事和香港社會問題，交流歐美學生運動的消息。

「交談中，我領會到珠海學生在獨立思考能力、責任感和社會意識上，都比一般年輕人強烈得多，他們原本都是成績很優秀的，只不過因為環境較差，如果要升讀大學，除了要自己努力，還要父母在經濟上作很大的犧牲，所以很多同學下課後，要回家幫手，或出外做兼職，我很欣賞他們。」

余神父對年輕人的謙虛和信任，加上他廣博的知識，很快便贏得學生的愛戴和同事的尊敬，短期內，就被晉升為外文系主任。

當時，珠海一群學生在校外一份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從希望到失望」，內容頗為前衛，大膽地指出珠海書院在多方面要改善的地方，這種權力挑戰，使校方感到非常震驚和憤怒，懷疑有左派學生滲入校園滋事，為了息事寧人，就閃電式的開除了十二名有份發表意見的學生。

可是，學生一方面要找個公道，另一方面擔心日後沒有機會升學，當中有人立即私自去找余理謙神父商量，尋求解決方法。

「首先，我希望學校改變初衷，我覺得撤銷學生校籍及趕他們出校，做得有點囂張，又不合法律程序，一篇勸喻文章，絕對不能構成犯法理由，明顯地握殺了學生言論自由的權利。」

其實，余神父亦急於伸出援手。

「我嘗試過多次約校長見面，但校長一直都避開我，十二名學生結果仍被開除。在無可奈何之下，我唯有寫了一封批評珠海學校的信，給全港報章發表，並聲明會繼續支持學生。」

余神父的信見報之後，全香港輿論嘩然，他的行動不但異乎社會常理，還帶著濃郁的政治火藥味，大家都想知道，究竟天主教、耶穌會、港英政府、左派工會、右派國民黨，都會採取甚麼方式去回應？在香港「反英抗暴」熱浪下，余神父這個「洋和尚」會怎樣收場？

一夜之間，余理謙神父成為報章爭相報道的頭條新聞，全香港的人都在街談巷議。

傳統中的天主教會一向主張和平共存，絕少染指

政治，六零年代中國大陸變色，共產黨當權，大部分傳教士緊隨著數以萬計的難民，千辛萬苦避到香港，掙扎求存，除了面臨種種艱苦之外，在惡勢力陰影籠罩下，更絕對封口，不會隨便談論政治。當時的香港人視英國政府為神明，所謂「官字兩個口」，非常奉公守法，示威和遊行不但不常見，更被標籤為搗亂份子，無理取鬧的行為。

事實上，中國在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以後，發生前所未見的破壞和混亂，全球報章及電視機上，天天都見到數以萬計，威風凜凜的紅衛兵(1966 - 1969)，動作整齊一致的揮著毛語錄，走在街上遊行吶喊，誓要推翻傳統，打垮黨政機關的體系，摧毀歷史建築，關閉學校。他們瘋狂的呼聲，煽動了世界各地的青年，到處醞釀著熱烘烘的學生運動，香港地處中國邊緣，理所當然受到「紅潮」衝擊，許多人心裡有數，年輕人反叛年代來臨了。

珠海事件，就給人這麼一個山雨欲來的感覺。

(十) 當晚要向主教交代

余理謙神父對珠海事件記憶猶新，他繼續補充說：

「1969年秋天，正當珠海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要我當天晚上就去見徐誠斌主教 (Rev. Bishop Hsu, Chen-Ping Francis Xavier 1920-1973)，交代一下城裡最近發生的事。我心裡一怔，覺得事態比預料中嚴重，我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有點擔憂，腦海中出現一些從來未出現過的問題，甚至聯想到，很快會被逐出教會或驅逐出境，回鄉下耕田。」

稍為認識徐誠斌主教的，都知道他有著傳奇性的一生。

徐誠斌主教畢業於有東方哈佛之稱的上海聖約翰大學 (Saint John's University)，主修新聞，畢業後曾任復旦大學外文系講師，又獲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1949年，徐誠斌從聖公會轉信天主教後，自費到羅馬深造神哲學，1959年晉鐸，回港後，曾任《公教報》主編，做過公教進行社及公教真理學會主任，1969年5月，羅馬教廷委任徐誠斌繼承白英奇

(Rev. Bishop Lorenzo Bianchi, PIME 1951-1969)，徐誠斌成爲天主教香港教區第一位華人主教。

徐誠斌主教之被委任，證明教廷對中國教會的重視及期望，另一方面，令人意識到中國正在扭轉乾坤，一般人都保持樂觀態度。

「原來當晚要聽我解釋的，除了主教之外，還有四、五位教區高層人員，而徐主教卻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坐著。大家還沒坐好，就爭先恐後的向我審問，語調很不客氣，而且充滿責斥，我登時心裡覺得非常非常難受，但我只好用心聆聽，盡力回答。我們都知道，基本上彼此意見是分歧的，這樣下去，不知要爭持多久。臨別前，我用堅硬的語氣再說一遍：『我憑良心知道，替珠海學生爭取公道和言論自由是對的，我不會就這樣放棄！』

「之後，我帶著沮喪無奈的心情走出街來，對大家的無知和誤解，感到極度失望，預料我不會有甚麼好收場。

「回到華仁宿舍，已是深夜，正想就寢，突然電話鈴聲響個不停，我的會長龔樂年神父(Rev. Fergus Cronin, S.J., 1909-1990)從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打電話來，龔神父也不兜圈，直接地說在個多小時前，徐主

教給他電話，跟他談我的事。原來徐主教很欣賞我的原則，希望我不要放棄支持學生，繼續為學生爭取公道和自由，徐主教並且讚揚我這種行動勇敢。龔神父鼓勵我盡早再發一封公開信，向全香港市民表明我的立場。

「當夜，我內心一直非常激動，徹夜不能入睡。此後，徐主教和龔神父與我成爲莫逆之交，我知道他們的意見是一致而真誠的，兩人都在各種不同場合內，不斷用行動和言論來支持我和學生運動，我心裡實在十分感激。

「自從那次會面之後，徐主教每個月都有一、兩次請我到他辦公室，跟他交流關於青年及學生的心得，我們常常談上兩、三個小時，他非常支持我在學生運動的工作，很多次在天主教大專會議及週年避靜上，徐主教都給我們主持彌撒，更經常公開讚揚聯會的工作。」^{註八}

1970年12月4日，真福教宗保祿六世(Blessed Pope Paul VI, 1897-1978)趁著訪問菲律賓及澳洲途中，旋風式訪問了香港，由徐誠斌主教陪同下，在政府大球場舉行了彌撒。保祿六世雖然僅僅在鐵幕邊緣的香港立足了三個小時，已表達了他在位15年當中(1963 -

1978)，對中國人民從不間斷的關懷。但他的訪問卻引起香港、內地及臺灣許多朝野人士不滿，有些更藉故抨擊香港天主教區，徐主教僅上任一年，不用說，受到很大的刺激。

說到這裡，余神父想起一件難忘的事來：

「當時香港有一份英文週刊《遠東經濟評論》，曾在專欄很苛刻的抨擊徐主教，我寫了一篇很詳盡的文章去替他辯護。很不幸，徐主教做了主教僅僅四年，在1973年5月23日突然去世，當我知道徐主教逝世的消息時，我十分傷心，痛哭流淚了很久很久。」

(十一) 患難知己龔樂年

余理謙神父還在懷念著徐誠斌主教的時候，又想起他的另一位患難知己龔樂年神父(Rev. Fergus Cronin S.J.,O.B.E., J.P. 1909-1990)。

「在學生運動各方面百分百支持我的，除了徐誠斌主教，莫過於龔樂年神父了。

「他曾經在二次大戰期間，做過隨軍神師，有過人的智慧和速斷速決的性格，他不但是我的患難知己，更是我最尊敬的神長。他在1966年開始，做過我的會長，不知多少次曾經給我指點迷津，替我解困脫險。有一次，天主教大專學生在九龍明愛中心六樓舉行記者招待會，事前有記者問我會不會發表談話，當時香港的左派右派，明爭暗鬥，非常劇烈，自從珠海事件之後，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傳媒焦點，無論說些甚麼都會引來批評。

「我的立場非常敏感，於是我請教龔神父，是否應該出席及發言，他毫不猶豫就對我說：

“Go, James, Go! I want you to be there, to make

yourself visible!”

「龔神父這簡潔的一句話，好像給我注射了一支強心劑，使我精神為之一振，以後不但在記者會上，甚至在許多場合中，這個明確的指示使我充滿信心和力量，使我感到心靈舒適，使我可以暢所欲言，是我司鐸生活中最愉快的體驗。

「過了兩個月，當大專聯會舉行週年大會的時候，龔神父更不辭跋涉，從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趕來，到界限街明愛中心參加，並且坐在前排，表示支持學生，支持學運。」

在香港，認識龔神父的人很多，包括男女老幼，貧富貴賤，各行各業各階層的都有，半個世紀以來，龔神父無論被調到世界任何地方，他都要求返回香港服務，除了在華仁書院執教之外，還做過香港大學教授、利瑪竇宿舍舍監、英軍隨軍司鐸、耶穌會遠東區會長、香港房屋委員會成員、公教進行社社長、堂區主任司鐸、善會神師等等；此外又教授慕道班，還經常探訪監獄和醫院，可以說是鞠躬盡瘁。

後來，龔神父獲得香港政府頒授太平紳士銜頭(J.P.)，及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這位五十多年來熱愛青年，熱愛香港的耶穌會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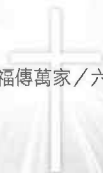
教士，不幸於1990年12月8日在香港逝世，龔樂年神父留給人們的印象，是他永遠和藹慈祥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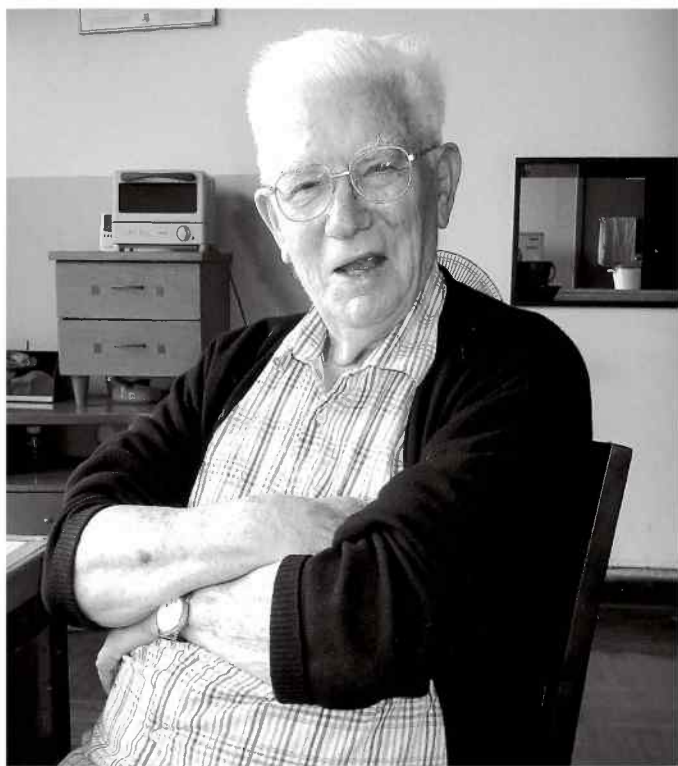
「1990年在龔神父彌留之際，幸好我及時趕到醫院，跟他握手道別，多謝他這些年來的支持和指導，他真是一位很好的耶穌會神父！」

說完徐主教和龔神父兩段振奮人心的故事，余神父一邊靠著椅子，一邊盯著牆上幾張相片，感慨萬分。

「我今年八十七歲，越來越接近天堂了！」

余神父從年輕時開始，就立志要做一個獻身中國的傳教士，這個使命和召喚，六十多年來，余神父從未有過一分悔意。





余理謙神父曾經在許多場合中支持學生民主運動，
他常常強調，香港的年輕人是「社會的良心」。

(十二) 去馬尼拉學習

1972年8月，余理謙神父突然收到通知，剛上任的耶穌會亞洲區新會長派他赴菲律賓堂區工作，休假學習一年。

「我在1970年的時候，曾經以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神師的身份，出席馬尼拉亞洲主教會議，會議中認識了不少亞洲教會的中堅份子，包括主教、神父，以及男女學生和青年。當時，大家都很自由的討論政治及社會問題，要關心的都直言不諱，氣氛激烈，層面廣闊。會議結束了，我們都期待有一天可以重聚，得以跟進及交流。所以，當我被修會派去菲律賓休假學習時，其實我是很高興、很珍惜這機會的。」

70年代隨著學生運動的興起，菲律賓到處爆發與軍警衝突的流血暴動事件，抗議政府貪污及獨裁，馬可斯總統(Ferdinand Marcos 1917-1989)遂於1972年9月21日宣佈全國軍備戒嚴令，並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隨意逮捕和拘禁了數千人。

余神父在馬尼拉這一年，剛巧遇上菲律賓戒嚴的

時候。

「獨裁者執政，反而令我有機會深入了解許多不同階層的人，也接觸過一些地下團體及秘密組織，通常我跟他們開會或見面，大家盡量穿著得像普通工人一樣，出入都要謹慎，無論是神父、主教或教友，盡量穿著普通，跟一般人無異。

「在菲律賓這一段日子裡，我真正體驗到亞洲地區的工人和學生強大的力量，又爲了爭取人權、民主和公義，爲了教會，爲了貧苦農工，要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有多大。

「一位主教曾對我這樣說：『年輕人可以做到的，只不過令政府官員、政治家，及社會人士看到問題的核心而已，換句話說，無形中他們就成爲社會的良心。』

「在菲律賓的時候，我體會到一點，香港青年和其他亞洲地區比較起來，幹勁和熱誠都很充足，但稍欠主動，並缺乏批判性及獨立思考能力，我希望回到香港後，可以在這方面下點工夫。

「1973年我收到一點消息，我被提名做天主教大專聯會亞太區的總神師，以接替斯里蘭卡(Sri Lanka, 1972年以前稱錫蘭Ceylon)即將滿任的包雷素神父

(Rev. Tissa Balasuria, OMI 1924-2013)。很可惜，我回到香港才知道，原來這項建議早就被我的會長否決了。」^{註九}

【巴雷素神父是斯里蘭卡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神學家，1953年晉鐸後，曾積極倡議各大宗教領袖攜手合作，徹底改革當時亞洲社會種種不平等現象。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巴雷素神父亦鼓勵教友，積極參與社會正義和平行動。他的解放神學思想及言論，在亞洲的年輕人當中，尤其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力。】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1970年八月主辦泛亞會議(Pan-Asian Conference)，在羅富國師範學院舉行，有十一個亞洲國家的青年代表參加，徐誠斌主教爲了公開表示他支持余理謙神父及亞洲學生運動，不但親臨主持香港學聯舉辦的泛亞會議開幕典禮，還替三十多位各國代表舉行彌撒聖祭，及在閉幕宴會中發表了談話。大會除了有徐誠斌主教主持開幕彌撒外，巴雷素神父亦曾就亞洲學生在社會中的角色，發表了詳細談話。徐誠斌主教對亞洲青年這份以言以行的鼓勵，使余理謙神父畢生感恩無盡。

余理謙神父又帶點幽默地說：



1970年八月，徐誠斌主教親臨泛亞會議支持亞洲青年。
右起為徐誠斌主教、羅理基醫生爵士、鍾炳基會長、
Pax Roman 亞洲總秘書。

「稍後，耶穌會委派我的新職位，遷到備修院去，我接納了負責培育初學修生的工作，但由於不能兼顧兩全，我唯有向徐誠斌主教申請，辭去大專聯會的工作，當時認識我的人，大家都有點無奈。不久，由於初學修生一年比一年少，不到幾年，備修院關門了，神父也失業了！我便想起一個藏在心裡很多年的夢想——到工廠打工去。」

(十三) 到製衣廠打工

余理謙神父在香港五十多年的傳教生活中，在工廠工作的經驗令他最難忘。

「在學生運動期間，我接觸過許多工人，也深入研究過他們的問題，很想有一天到工廠去實習考察。

「機會終於來了，1975年當耶穌會備修院停辦之後，我就申請到九龍一間製衣廠去打工，想直接體驗一下工人的生活，我做了僅僅四個月，但簡單又容易的裁衣工作，日以繼夜，重複又重複的去做，沉悶得令我幾乎精神崩潰。

「這次工廠的經驗，給我很大啓示，雖然我每天工資不過十多元，而工作又非常枯燥，但我感到很充實，我曾經把這些經驗寫了兩篇文章，寄到一份德國雜誌刊登，他們並且給了我一大筆稿費。

「有一次在工廠休息的時候，我拿出馬克思(Karl Marx 1818 - 1883)的小書《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來消磨時間，突然感到這本書非常驚心動魄。其實以前，我在不同環境看過許多次

馬克思的著作，都覺得乏而無味，反而這一次我坐在工廠的板櫬上，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使我對他的思想、信念和一生的經歷，完全改觀。

「從開始，馬克思的革命言論就到處被人排斥，他當時不過廿歲左右，已經被德國和法國政府驅逐出境，終於流落英國，生活潦倒，親人疏遠，寂寂無名地度過了三十四年的寫書和研究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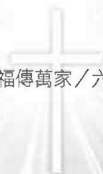
「2005年，我回愛爾蘭度假途中，曾經專程去過位於倫敦的馬克思墳墓，默哀致敬。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呼籲全世界勞動工人團結起來，爭取階級平等，這種激進而前衛的言論，不但領導了世界政治潮流，甚至改變了千千萬萬貧苦大眾的生命，他真是一位劃時代的先知！

「可惜在70年代，世界上許多地方不是怕年輕人攪破壞，就是怕共產黨滲入。」

工廠生活雖然短暫，卻令余神父體驗到香港基層社會的憂苦喜樂，更使他對馬克思主義完全改觀，他更希望有一天能夠在勞工階層中做些牧民工作。其實，他也懷念初到香港時，在長洲堂區的愉快經驗，所以離開工廠之後，余神父又做了一次避靜，尋找新方向。

當時牛頭角基督勞工堂正在迅速發展，剛巧需要多一位神父幫忙，就邀請余神父過去。當年，教友和大部分居民都是勞工階層，分別來自京士柏、九龍仔及深水埗等地，附近又有很多工廠大廈和徙置區，是個名副其實的勞工堂區。余神父隨即答應了，就這樣一直留守在基督勞工堂十一年，其間除了成立青年社會服務小組，還積極投入國際特赦組織的活動，關心囚犯，照顧囚犯家人的需要。



(十四) 迂迴曲折先知路

余理謙神父做了堂區工作之後，不但沒有放棄學生運動的工作，仍然在許多場合中強調，香港的年輕人是「社會的良心」及「地上的鹽」，余神父常把學生示威，比作先知的見證：

「無疑年輕人的經歷和資源非常有限，但他們的熱誠和慷慨，是香港民主正義的動力，也是教會用福音精神去貫徹現世事物的好榜樣。」

自從1962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教會鼓勵教友積極參與社會正義和平的行動，分擔弱勢社群的憂慮和喜樂，以基督精神革新現世秩序，這梵二的精神，本來就是余神父一貫的信念，可惜，偏偏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余神父受到很多人的攻擊，常常令他感到孤軍作戰：

「我覺得自己越來越似先知，因爲先知是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他們常常被人排斥，先知的敢說敢言和標奇立異的行動，在世人眼中絕對不被容忍，但這種使命感，令我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天主。」

余神父很坦白地說，自己雖然在修院選讀過一點關於先知的課程，對於先知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

「有一次在翻閱舊約亞毛斯先知書(Prophet Amos)的時候，我突然覺悟到，做先知要付出很高代價。」

余神父拿出聖經來引證之後，又想起一件事。

「1970年，我和幾位香港天主教大專同學，去馬尼拉開亞洲主教會議，有一天會議結束後，一位主教 Rev. Bishop Perez 駕車送我們回宿舍去，我們在車上閒談了一些當地教會的情況，主教突然轉過頭來，對著我們說：『神父，你們是活在我們中的先知！』」

先知這個名詞，很容易被人跟占卦算命的人混為一談，其實這個角色在古經和新經中都不斷出現，比方在猶太民族史上，梅瑟既是以色列民族的創立者，也是最大的先知，他在被召後，以堅強的信心和毅力，將以色列民從埃及人的奴役中救出。在新約《路加福音7:26》中，耶穌稱讚聖若翰洗者：比先知中的先知還大。聖若翰以大無畏的精神，在人前見證，指責黑落德的罪行，以至捨生捐軀。

時至今日，許多知名的聖人聖女，如真福德肋撒修女、聖教宗若望廿三世，及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甚至許多寂寂無名的教友、學生、工人和家庭主

婦，都負起時代先知的責任，以言語行動抨擊社會不公義。

余神父很同情目前香港的年青人，他們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上要承受許多壓力，很多學生會的幹事職位都有空缺，如此下去，青年人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聲音會越來越弱。余神父感觸地說：

「正義和平的行動要積極參加，先知的路迂迴曲折！」

(十五) 余神父常用的四節箴言

1. 《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導言》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
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
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

2. 《路加福音4:17》

「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他遂展開書卷，
找到了一處，上邊寫說：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
因為他給我傅了油，叫我給貧窮的人報喜訊，向
俘擄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叫那受壓迫
者獲得自由，宣報上主恩慈之年。」

3. 《天主教教理》2446：對窮人的愛護

「金口聖若望強而有力地提醒：
不讓窮人分享我們的財產，就是偷竊他們，
除掉他們的生命。我們所持有的財物，

不是我們的，是他們的。」

4. 聖大額我略：《牧民守則》

「當我們給與貧窮者必需的物品，
我們不是把我們的慷慨施予他們，
我們是還給他們，原來屬於他們的東西。
與其說，我們完成一項愛德的行為，
不如說作了一個正義的行動。」

(十六) 返鄉下耕田

2014年7月，我爲了查核一點資料，給余理謙神父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兩個多月都沒有回音，九月中才知道，余神父因危病住了醫院很久，他回電時，劈頭就說健康情況不好，已決定十月尾回愛爾蘭，他稱是「返鄉下耕田！」與香港永別矣。

我想起1969年的珠海事件中，余神父因爲學運風潮，當晚要見徐誠斌主教，余神父突然覺得，事態比預料中嚴重，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擔憂，甚至聯想到很快會被驅逐出境，要「返鄉下耕田！」

余神父從1952年開始，下定決心到中國傳教，爲香港人奉獻了一生，誓死不回。「返鄉下耕田」含有被貶、自嘲和沒奈何的意思，就等於功未成而身先退，是一種侮辱。當然，這次也不例外，因爲健康比預料中更差，要回到離別了六十多年的祖國愛爾蘭(Ireland)都柏林(Dublin)的耶穌會總會院休養。

就這樣，前後不到三十天，經過一連串的歡送活動，跟昔日的朋友道別之後，余神父含著淚，帶著無

奈，於2014年10月28日永別香港了！

其後，一位熱心鄒教友給我寫信道：「10月26日是余神父最後一次在香港公開舉行彌撒，當天也是余神父88歲生日。彌撒後，教友請他出來講幾句說話，這短短十分鐘，我覺得他很辛苦，只想一切快些過去，他可以在老家安頓下來，心境平靜地度過晚年。」

另一位很熟悉余神父的朋友子良寫道：

「昨天，有兩架車送Father Hurley和他的行李到機場，情況應順利。我們沒有送機。前天，我拿了仙靈和另一位朋友剪輯燒錄好的DVD光碟和USB記憶筆，到九華送給他，給他說了一句情不自禁的話：『感謝你為我們香港貢獻了一生！』與他擁抱後，大家深情相望，大家拖著手，他送我到升降機後，我便離開了。」

在最後留港的一天，余神父心情如何，天曉得啊！

只能渴望，聖神的喜樂，永遠充滿余理謙神父謙仁美善的偉大心靈！

註釋

- 註一：巴富街官立中學(Perth Street Government Middle School)於1959年創辦，首屆新生都是從小學會考中選錄，初期僅取錄132人，且全是男生。學校首兩年用英軍棄置的軍營做校舍，班房是黑色柏油的單層平房，比鄰的英皇佐治五世學校(King George V School)，亦原是英軍醫院。1961年政府決定重建校舍，1964年新校落成。1969年，學校易名為何文田官立中學(Homantin Government Middle School)，現在已由Middle School轉為Secondary School。
- 註二：香港六零年代，新興塑膠行業，許多人在租金低廉的木屋區內自資設廠，街頭巷尾都擺放著化工燃料，聞說該次火災由專門製軍服的一家帆布廠漏電開始，大火一發不可收拾，短短數小時之內令千餘居民在寒夜中頓告無依，詳情請查閱1964年2月2日(星期日)的香港《星島日報》。
- 註三：引自李韓玲著《分享阿玲的報告：香港精英背後的心靈推手》，[阿祥故事網頁]，2013年9月。
- 註四：據《維基百科》2012年12月6日資料，華仁書院本屬聖若瑟書院校友徐仁壽在1924年私人創辦，稍具規模後，在1932年移交當時很渴望辦專上教育的耶穌會管理，徐仁壽自己卻退休到婆羅洲經商。
- 註五：據2012年9月27日《香港文匯報——當年學聯保釣，今日學聯反中》追述當年情景：[1971年4月10日，香

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發動釣運頭炮抗爭，動員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示威，大量警察在街頭排成人牆，阻止學生前進，衝突中有多達21人被捕，其後激起學生反抗情緒，學運頓然蓬勃起來。同年5月4日，保釣者在中環皇后碼頭側空地舉行示威，再有12名青年被捕，其餘示威學生轉到美國領事館前示威聲援，並舉行抵制日貨大會。]。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9/27/YO1209270001.htm2014年11月下載。

註六：《Ad Apostolorum Principis》(29 June 1958)梵蒂岡教庭網址。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12/2014年11月下載。

註七：茅盾著《我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1981年。頁218 - 256。

註八：徐誠斌主教曾於1970年香港學聯主辦的泛亞會議中對學運公開支持，據《公教報》1970年7月24日的報道：徐主教不但在開幕日主持彌撒，更在閉幕晚會中向十一個亞洲國家的青年代表致詞，讚許他們參與正義和平的行動。

註九：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Catholic Students，簡稱HKFCS，隸屬國際公教專上學生聯會Pax Romana -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Catholic Students，簡稱IMCS)。余理謙神父被提名擔任Pax Romana亞太區的總神師。